

秦汉社会民生信仰研究

——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

吕亚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秦汉社会民生信仰研究

——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

吕亚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社会民生信仰研究：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 / 吕亚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512 - 3

I. ①秦… II. ①吕…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中国—
秦汉时代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81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李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3.75
插 页	2
字 数	539 千字
定 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获得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及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科建设经费的资助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意义	(1)
二 研究现状	(4)
三 研究目的	(11)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婚姻嫁娶信仰	(13)
第一节 嫁娶与时日宜忌	(14)
第二节 嫁娶与时空方位宜忌	(41)
第三节 嫁娶与神煞宜忌	(50)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祈生孕育信仰	(75)
第一节 两性交合时日宜忌	(76)
第二节 祈孕及孕期宜忌	(83)
第三节 胎儿性别转换与占卜	(93)
第四节 时日、方位与生子宜忌	(101)
第五节 生子不举	(135)
第六节 产后藏胞与妇幼保健信仰	(153)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死丧葬埋信仰	(171)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死日宜忌	(171)
第二节 招魂、铭旌与归煞信仰	(182)
第三节 葬埋时日宜忌	(209)
第四节 “告地书”中的冥界信仰	(218)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裁衣佩饰信仰	(231)
第一节 裁衣时日宜忌	(231)
第二节 佩饰与辟邪祈福	(245)
第五章 秦汉时期的出行归往信仰	(269)
第一节 行归择吉	(269)
第二节 祠行祖道	(303)
第三节 行时除道	(335)
第四节 急行厌胜	(349)
第六章 秦汉时期的疾病疗治信仰	(359)
第一节 致疾观念	(360)
第二节 问疾时日与疾病占卜	(387)
第三节 疗疾手段	(398)
第四节 疗疾时日宜忌	(424)
第七章 秦汉时期的梦幻占禳信仰	(429)
第一节 梦的认知	(429)
第二节 梦的占卜	(434)
第三节 梦的禳除	(449)
第八章 秦汉时期的农事艺植信仰	(457)
第一节 农事生产时日宜忌	(457)
第二节 祠先农信仰	(469)
第三节 禳除鼠害信仰	(484)
第四节 树木植、伐时日宜忌	(495)
参考文献	(505)
后 记	(534)

绪 论

一 选题意义

民生信仰是社会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同民俗心理、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也是对普通民众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真实反映。因此，民生信仰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内涵，诸如对自然万物、神灵鬼魅的尊崇与畏惧，对巫术、禁忌以及风角、堪舆、占星、择日等术数方技类的迷信等都属于民生信仰的内容。

作为“俗文化”或“潜文化”范畴的民生信仰，其内容更多是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如农事生产的顺利、嫁娶生育的美满、出行归往的平安、疾病灾异的救治、人事交往的和谐、六畜饲养的蕃息，以及对各种灾异的避忌等），故民生信仰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它曾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当然，它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尤其是在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和认识观念中仍然有着特殊的影响力。秦汉时期不仅是我国汉民族及其民族文化心理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民生信仰文化的重要奠基阶段。因此，对这一时期社会民生信仰的探索，有助于我们积极、有效地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而为民族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文明发展提供更多思路和有益参考。

我国学术界对于社会民生俗信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顾颉刚、钱玄同等先生发起的民俗学会。在顾、钱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与会学人通过田野调查和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梳理，先后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民俗信仰文化的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至今仍是民俗信仰文化研究者不可不加利用的重要资料。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认知的提高以及文化史学的发展,民生信仰习俗研究也成为其研究领域中的应有课题,相关研究成果也陆续面世。然而,由于传统文献关注的主要是王朝政治和上层人物的活动,而对普通民众的生活、生产少有记载,目前的研究成果除了极少数专著能及时吸收地下出土的新资料外,多数论著或论文还是依赖对传统文献史料的钩沉和梳理,因而研究成果难有创见和新意。例如对秦汉时期社会民生信仰的内涵及相关俗信背景,以及它对后世民俗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讨论,各类通论性著作即便涉及,也多是泛泛而论。有些研究结论,如果以近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资料证之,实多可商之处。譬如“祠先农”信仰,文献记载最早溯及汉代,而湖南里耶秦简以及周家台 30 号秦墓简牍所出资料可将其至迟溯及秦代;汉代的“腊”祭时间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而周家台秦简资料显示,秦代的腊祭之期与汉代并不相同,以戌日为腊祭之期乃汉代特有;中国古代孕育俗信中的经后求子、胎期宜忌、胎儿性别转换、藏埋胎胞等信仰,较为系统的记载最早见于六朝时人所著的《产经》(该书后亡佚),此后的医书有关此类信仰的资料大多是对《产经》所载的辗转相抄,而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房内记》^①等资料的出土,不但可将此类孕育信仰习俗上溯至战国时期,也可证明汉魏以后医书所载此类内容均与马王堆汉墓资料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禹步、符箓以及为出行、疗疾、农事丰产、禳梦等举行的法术仪式并非后世道教的发明,早在先秦时期已产生;阴阳五行思想在战国末至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当时以及后世社会民生信仰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成为秦汉及其以后我国古代民生信仰的理论基础和俗信背景,但对此一问题的认识,以往讨论多基于汉魏以降的传世文献资料的记载,因而并不充足。此外,中国早期先民对疾病病源的认识、从巫医不分到巫医分离、中国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建立、鬼神观念的转变、各种择吉信仰的形成、建筑风水信仰的发展等问题,随着大批简帛文献资料的面世,也应给予重新的认识和思考。

^① 按,《房内记》原与《疗射工毒方》书写在一卷帛上,原整理者将其合为一篇,命名《杂疗方》。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集成》(中华书局 2014 年版)一书将其内容分为《房内记》、《疗射工毒方》两篇并单独命名。今从之。

1925年暑期,王国维先生受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作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著名演讲。在这次演讲中,王国维先生敏锐地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古未有能比者也”,并将“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与殷墟甲骨文、敦煌写本、内阁大库之书籍档册等并列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学术发现,认为“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他还以“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①来激励后学研究这些新发现的学术资料。王先生身后,地不爱宝,不仅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先后发现了大批两汉简牍,而且还在内地的湖北、湖南、河南、江苏等地^②出土了大批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这些新材料的相继面世,引发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关注,在发表许多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使得简帛研究这门新学问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当代学术之显学”^③。

受传世文献资料的限制,过去研究早期中国思想文化,多注重于精英阶层人物及其思想,对于更为广泛思想背景层面的一般民众的思想面貌却少有关关注。随着作为实用手册性质的《日书》等数术文献的大批面世,在弥补传世文献相关记载不足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早期一般民众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提供了可能。基此,近年来的历史研究日益呈现出由精英到平民,由雅到俗的转化趋势,尤其是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研究更为突出。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思想史中并不能抛开这一部分“一般知识与思想”,一方面,正是这些知识与思想才真正地活生生地支配着人们的切实的生活;另一方面,正是这些知识与思想的水准,才是估定一个思想时代人们知识的基准。^④而在儒家人本主义之外,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另

① 王国维著,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② 目前,全国各地发现简帛的有北京、河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等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又以湖北、湖南、甘肃、内蒙古等地发现数量为最多。详参骈宇騫、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及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等书的介绍。

③ 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小引》,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④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外一条线索，即以数术方技为代表，上承原始思维，下启阴阳家和道家，以及道教文化的线索。^① 如果我们把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体系视作中国文化巨厦的上半部分的话，那么以简牍《日书》等数术文献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形态则构成了中国文化巨厦的基础和下半部分。秦汉时期正是我国古代民俗信仰理论——阴阳五行思想的系统化和早期数术方技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这些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在出土的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中多有记载。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资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② 简帛帛书正是 20 世纪初以来所陆续发现之新材料。随着大批简帛文献资料的相继出土和陆续整理刊布，尤其是简牍《日书》、简帛医方以及其他术数方技类简帛文献资料的公布，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传世文献记载阙如的秦汉时期社会民生信仰方面的大量信息。

基此，从出土秦汉简帛文献资料入手，结合其他出土文字资料（如玺印、封泥、碑刻、玉石等）以及传世文献资料、民俗志史料，力求以较为丰富的最新资料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民生信仰文化及其信仰原理进行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探索阴阳五行思想何以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国人的“思想律”以及这种思维模式对我国后世民众信仰俗信的深远影响，亦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民生信仰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特点，借此亦可弥补当前学术界因传统文献记载不足以及相关文献记载滞后性而对此一时期社会民生信仰文化尚缺乏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化研究的现状。在目前看来，这仍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二 研究现状

对社会民生信仰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初，一些学者在从事民俗学的研究时便已撰文或论著涉及此一话题。如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 页。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2 分册），1930 年，第 231—232 页。

的迷信》、《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等^①，黄石《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关于孕育的迷信与风俗》、《什么是“胎教”》等^②，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及《释巫》^③，李安宅《巫术问题的解析》^④，孙作云《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⑤，等等。这一时期对秦汉时期社会民生信仰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多有涉及。如荪荃《预兆（汉风俗之一断片）》、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克凡《汉代婚丧礼俗考》、童书业《汉代的社稷神》、胡嘉《汉人祀灶考》、劳干《汉代社祀的源流》^⑥，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内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学术界对于秦汉时期社会历史的研讨多集中于政治史、经济史领域，对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民生信仰问题关注不多，仅有孙作云先生的《汉代司命神像的发现》、向仍旦先生的《史树青讲“从〈风俗通义〉看汉代的礼俗”》^⑦等少量文章有所涉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热潮的升温，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民生信仰问题逐渐为学术界所重新关注和重视，随之陆续刊布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通论性、专题性、断代性研究三类。

① 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年版；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外，江绍原先生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其他涉及民生信仰的论文可参见王文宝、江小蕙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② 《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一文原载《新女性》第3卷第10号，1928年10月；《关于孕育的迷信与风俗》一文原载《妇女杂志》第16卷第10号，1930年10月；《什么是“胎教”》一文原载《妇女杂志》第17卷第11号，1931年11月。以上文章以及黄先生此一时期所写其他民生信仰内容的文章一并收入高洪兴编《黄石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

③ 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广业书社1928年版；瞿兑之：《释巫》，《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

④ 李安宅：《巫术问题的解析》，《社会问题》第1卷第1期，1930年4月。

⑤ 孙作云：《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民族杂志》第5卷第1期，1937年。

⑥ 荪荃：《预兆（汉风俗之一断片）》，《新晨报副刊》1928年10月26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1930年第1期；克凡：《汉代婚丧礼俗考》，《出版周刊》第117卷，1935年2月；童书业：《汉代的社稷神》，《天津益世报史》1935年第16期；胡嘉：《汉人祀灶考》，《逸经》1937年第21期；劳干：《汉代社祀的源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第49—60页。

⑦ 孙作云：《汉代司命神像的发现》，《光明日报》1963年12月4日；向仍旦：《史树青讲“从〈风俗通义〉看汉代的礼俗”》，《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通论性研究通常从整体上对民生信仰问题进行纵向论述研究。如曲彦斌主编的《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李安辉主编的《中国民俗史丛书》、陈高华和许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庄华峰主编的《中国社会生活史》、徐杰舜主编的《汉族风俗史》、钟敬文主编的《中国民俗史》、马新等所著《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远古——隋唐五代）》等。^① 此类研究成果多是以系列论著形式出现，其内容则是按照时代顺序作断代性质的研究，而其所用文献资料则多以传世文献为主。

专题性研究多从某一角度展开来讨论。如围绕巫及巫文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刊布了相当多的成果。^②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战国秦汉简帛文献资料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如李零《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二书对早期方技、术数信仰展开专题性论述^③；王光华的博士论文《简帛禁忌研究》、晏昌贵所著《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以及拙著《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等成果即利用出土简帛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的卜筮、巫术、禁忌等方术宗教民俗事象作了较为深入的专题性研究。^④ 此外，近年所出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一书从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出发，讨论了巫对中国“大传统”的影响，即巫如何形成了礼，礼的发展又如何生发出仁，而巫与“小传统”的结合，又如何形成今日尚存的巫术，借此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理路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⑤；刘黎明《灰暗的想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仰研究》一书以古代民间巫术为研究对象，从古代民间巫术

① 曲彦斌主编：《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李安辉主编：《中国民俗史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高华、许吉军主编：《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庄华峰主编：《中国社会生活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徐杰舜主编：《汉族风俗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马新、贾艳红、李浩：《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远古——隋唐五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吕亚虎：《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③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版），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④ 王光华：《简帛禁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晏昌贵：《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吕亚虎：《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的类型、民间巫术与社会政治、民间巫术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区别于正统宗教组织的民间巫术信仰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①；高国藩在其《中国巫术史》一书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资料，扩充为《中国巫术通史》，更为全面、系统地考察和探索了我国各类巫术的流变史，^②等等。

断代性研究则是以某一历史时期为时空线索来展开的。就秦汉时期的民生信仰问题研究来说，相关研究成果如林富士所著《汉代的巫者》一书从宗教学、社会学角度深入探讨了汉代巫者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力^③；马新所著《两汉乡村社会史》一书第六章“两汉民间信仰与乡村神祇崇拜”部分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汉代乡村神祇的主要构成、鬼怪的类型、崇拜的特点，并系统论述了两汉巫与巫术的盛行、两汉巫术的形式以及民间禁忌与择吉之术等问题^④；文镛盛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一书以秦汉时期为主，考察了巫觋在古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研究其社会活动、社会性格及其面貌的转变^⑤；彭卫、杨振红所著《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一书第九章“信仰风俗”对当时的神灵信仰、鬼怪世界、方术等问题作了研究^⑥；郭必恒等所著《中国民俗史·汉魏卷》一书第六章“信仰民俗”对当时的自然神信仰、鬼怪信仰、巫术等问题作了分析^⑦；贾艳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汉代民间信仰研究》则对战国至秦汉时期神祇的发展趋势、建构、基本特色和两汉巫的社会存在形态、基本职能、社会地位以及汉代民间生活中的信仰及其社会功能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⑧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孙家洲《汉代巫术巫风探幽》、胡新生《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赵世超《巫术盛衰与西汉文化》、具圣姬《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马新《论汉代民间的巫与巫术》、蒲慕州《汉代之信仰生活》、李零《先秦两汉文字资料中的“巫”》、赵光怀《汉

① 刘黎明：《灰暗的想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14年版。

② 高国藩：《中国巫术通史》，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③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稻乡出版社1988年版。

④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⑤ [韩]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⑥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⑦ 郭必恒等著：《中国民俗史·汉魏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⑧ 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4年。

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等^①，也从不同角度对汉代的巫、巫术及相关信仰问题展开了讨论。

此外，近年来，从出土简帛文献（尤其是《日书》及医方类）资料入手对某些问题展开专题性研究的论文也不少。如王桂钧《〈日书〉所见早期秦俗发微——信仰、习尚、婚俗及贞节观》、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陈农《〈马王堆帛医书〉的胎产生育观》、李建民《马王堆汉墓帛书“人字”图考释》、李建民《马王堆汉墓帛书“禹藏埋胞图”笺证》、尚民杰《〈日书〉“男女日”与“生子”》、吕亚虎《马王堆汉墓资料所见求子巫术浅析》、吕亚虎《帛书〈胎产书〉所见早期孕育信仰浅析》等文对秦汉时期的婚嫁、孕育信仰作了研究^②；范志军《从〈日书〉看汉代人的葬日》、宋艳萍《先秦秦汉丧葬习俗中的术数行为》等文对秦汉时期丧葬习俗中的择日及其他术数行为作了讨论^③；李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吴小强《论秦人宗教思维特征——云梦秦简日书的宗教学研究》、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研究》、刘信芳《〈日书〉驱鬼术发微》、刘钊《谈秦简中的“鬼怪”》、吴荣曾《汉简中所见的鬼神迷信》、徐富昌《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鬼神信仰》、刘伟《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中的鬼、神和怪》、

① 孙家洲：《汉代巫术巫风探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胡新生：《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赵世超：《巫术盛衰与西汉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韩]具圣姬：《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马新：《论汉代民间的巫与巫术》，《文史哲》2001年第3期；蒲慕州：《汉代之信仰生活》，载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李零：《先秦两汉文字资料中的“巫”》，载氏著《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2页；赵光怀：《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王桂钧：《〈日书〉所见早期秦俗发微——信仰、习尚、婚俗及贞节观》，《文博》1988年第4期；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陈农：《〈马王堆帛医书〉的胎产生育观》，《上海中医药杂志》1993年第8期；李建民：《马王堆汉墓帛书“人字”图考释》，《大陆杂志》第90卷第5期，1995年5月；李建民：《马王堆汉墓帛书“禹藏埋胞图”笺证》，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4分册），1994年；尚民杰：《〈日书〉“男女日”与“生子”》，《文博》2000年第1期；吕亚虎：《马王堆汉墓资料所见求子巫术浅析》，《历史教学》2008年第2期；吕亚虎：《帛书〈胎产书〉所见早期孕育信仰浅析》，《江汉论坛》2009年第6期。

③ 范志军：《从〈日书〉看汉代人的葬日》，《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宋艳萍：《先秦秦汉丧葬习俗中的术数行为》，《管子学刊》2008年第2期。

郝振南《〈日书〉所见秦人鬼神观念述论》等文章对秦汉时期的宗教鬼神信仰作了深入分析^①；袁玮《〈五十二病方〉祝由疗法浅析》、张丽君《〈五十二病方〉祝由之研究》、孔慧红《〈五十二病方〉与巫术文化》、李丛《〈五十二病方〉禁咒内容研究》、陈伟《放马滩秦简日书〈占病祟除〉与投掷式选择》等文章对秦汉时期的巫祝禁咒医疗信仰作了探讨^②；黄盛璋《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复》、黄盛璋《邗江胡场汉墓所谓“文告牒”与告地策谜再揭》、陈松长《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刘夫德《铭旌的图像与文字》、汪桂海《汉代简牍中的告地策资料》等文章对秦汉时期的丧葬信仰作了分析^③；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胡文辉《马王堆〈太一出行图〉与秦简〈日书·出邦门〉》、刘增贵《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和信仰》、吕亚虎《出土简帛资料所见出行巫术浅析》及《〈额济纳汉简〉所见出行巫术浅析》等文章以及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一书第六章“先秦社会的行神信仰和禹”及第七章“《日书》所见道教风

① 李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吴小强：《论秦人宗教思维特征——云梦秦简日书的宗教学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刘信芳：《〈日书〉驱鬼术发微》，《文博》1996年第4期；刘钊：《谈秦简中的“鬼怪”》，《文物世界》1997年第2期；吴荣曾：《汉简中所见的鬼神迷信》，载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54页；徐富昌：《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鬼神信仰》，载《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第873—926页；刘伟：《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中的鬼、神和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郝振南：《〈日书〉所见秦人鬼神观念述论》，《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袁玮：《〈五十二病方〉祝由疗法浅析》，《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张丽君《〈五十二病方〉祝由之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第3期；孔慧红：《〈五十二病方〉与巫术文化》，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李丛：《〈五十二病方〉禁咒内容研究》，《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陈伟：《放马滩秦简日书〈占病祟除〉与投掷式选择》，《文物》2011年第5期。

③ 黄盛璋：《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复》，《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黄盛璋：《邗江胡场汉墓所谓“文告牒”与告地策谜再揭》，《文博》1996年第5期；陈松长：《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刘夫德：《铭旌的图像与文字》，《文博》2008年第4期；汪桂海：《汉代简牍中的告地策资料》，载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8页。

俗”等对秦汉时期的出行归往信仰作了探析^①；王勇《五行与占梦——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一文对秦汉时期的占梦信仰作了研究^②；金良年《“五种忌”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张铭治和王育龙《西安杜陵汉牒〈日书〉“农事篇”考辨》、彭浩《读里耶“祠先农”简》、吕亚虎《试论秦汉时期的祠先农信仰》等对秦汉时期农事生产信仰进行了讨论^③，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正确理解秦汉时期的民生信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限于篇幅，还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在此无法详陈，我们将在后文讨论具体问题后再详征引。

虽然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从总体上讲，目前学术界对秦汉时期社会民生信仰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如下不足之处：第一，通论性研究成果虽然较有系统性，但多以传世文献资料为主，很少关注和重视对新出土简帛文献资料的运用，故对某些问题的讨论因传世文献资料自身的局限（即内容多以王朝政治和上层社会人物活动为主，对中下层民众生活、生产及精神世界的记载则较少）而不够深入，有些论述显得泛化，甚至有些结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第二，专题性研究多从某一角度展开讨论，虽比较深入，但缺乏对这一时期民生信仰研究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分析；第三，断代性研究虽以秦汉时期为研究的时空线索和界限，但目前的研究成果要么缺乏对新资料的运用而不够深入，要么进行断代专题性的讨论而缺乏综合性梳理和系统化研究。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胡文辉：《马王堆〈太一出行图〉与秦简〈日书·出邦门〉》，《江汉考古》1997年第3期；刘增贵：《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和信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3分册），2001年，第503—541页；吕亚虎：《出土简帛资料所见出行巫术浅析》，《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吕亚虎：《〈额济纳汉简〉所见出行巫术浅析》，《殷都学刊》2009年第2期；〔日〕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日〕广濑薰雄、曹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② 王勇：《五行与占梦——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

③ 金良年：《“五种忌”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史林》1999年第2期；张铭治、王育龙：《西安杜陵汉牒〈日书〉“农事篇”考辨》，载周天游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13页；彭浩：《读里耶“祠先农”简》，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4页；吕亚虎：《试论秦汉时期的祠先农信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有鉴于此，本书在充分借鉴和吸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以出土简帛文献资料为主，结合传统文献资料及其他资料，将秦汉时期社会民生信仰问题放在当时社会文化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探赜索隐、溯流问源，对其所反映的民生信仰内容、依据原理以及此类信仰对后世民众民俗文化心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考察，借此弥补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在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

三 研究目的

秦汉时期是我国民俗信仰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出土秦汉简帛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的《日书》资料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其内容涉及当时社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信仰，是其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的实态，代表了当时中下层民众的文化形态与价值取向，它与今天仍流行于我国民间及港台地区的通书或黄历一脉相承，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经久不衰的一面，也为研究我国早期社会生活史及民俗信仰的思维特征提供了珍贵的基本素材；秦汉简帛文献中的多批医方资料，其内容不仅有传统医学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包含大量原始巫术思维的疗疾方法和手段，这对认识当时社会民众生活中的祈生孕育、妇幼保健、疾病医疗等信仰弥足珍贵，而这些民俗信仰内容在后世民俗生活中不但广为流传，且影响极为深远。有些巫术性医疗方法和医疗手段后来还被道教所承袭，成为其符咒法术仪式的重要内容（如禹步、符咒、唾襻等）；出土秦汉简帛文献中的其他术数资料对当时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行事择吉、趋利避害信仰心理也有大量真实的反映。因此，从出土秦汉简帛文献及其他文字资料入手，结合传世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的民生信仰习俗文化加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和正确认识它对后世民生习俗及民族文化心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民生信仰文化理论形成和进一步系统化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阴阳思想和五行学说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发展，除五德终始说外，后世选择通书中的五行生克、五行三合局、五行无气、五行之数、五行阴阳相冲、五行阴阳穷绝、五行配四方和四季等理论都已成为当时民生信仰习俗的主要理论依据。作为中国人的“思想律”的阴阳五行学说